

《東華漢學》第4期；頁113-145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2006年9月

## 永樂至弘治間吳中文士的楚辭論

陳煒舜\*

### 【摘要】

永樂以後，臺閣諸臣主導文壇百年，至正德間才為前七子的師古說所取代。臺閣作家崇尚沖融演迤的風格，其興起與皇權膨脹、道學獨尊有直接的關係。由於儒家認為屈子行徑有失中庸，《楚辭》文章華而少實，臺閣作家多罕言屈騷。在時局變易、學風移轉、地域文化、個人經歷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此百年中漸有起而與臺閣文風抗爭的學者。這些學者以吳中文士為主，他們視七子有筆路藍縷之功，實為明代師古說的先驅者。其文學思想的重要一環，就是對《楚辭》的論述。因為屈騷的獨特性，學術

---

\*佛光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風氣在儒學主導的傳統社會中一旦有變，新的學術特色很快就體現於《楚辭》論。本文探討了永樂至弘治間吳中文士楚辭研究的發展脈絡，並析論這些學者如何通過《楚辭》來抗衡、改造流弊已深的臺閣文風。

關鍵詞：吳中文士 師古說 《楚辭》 臺閣諸臣 明代文學

## 引言

明代永樂朝後，文風一變，文崇歐曾、詩尚王孟的臺閣諸臣被視為文學之正宗，領導文壇一百多年。孔德成論此派的提倡者、代表作家楊士奇（1365—1444）云：「作品紆徐閒雅，極與歐陽修相似，其甚者膚廓空洞，缺乏生氣，視明初宋(濂)、劉(基)、方(孝孺)、諸家之聲情煊赫，氣象闊大，迥不相侔矣。」<sup>1</sup> 許總論述這百年間的文學發展狀況，指出盛行於仁宗、宣宗兩朝的臺閣文風，一直延續到英宗、景帝時還有相當大的影響。但英宗、景帝時期，明代經過一系列政治事件和學術積累，文風、學風已出現變化，以于謙（1398—1457）、王越、郭登等人為代表，開始摒棄雍容華貴的臺閣體，面對實際的社會問題寫出慷慨悲涼的詩篇。<sup>2</sup> 奪門之變，英宗復辟；其後憲宗即位，國勢雖已不及國初，而海內富庶，敗相未露，於是臺閣文風又得復起。不過，仁宣盛世一去不

<sup>1</sup> 孔德成：《明清散文選注》（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初版），頁52。

<sup>2</sup> 許總：《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南昌：百花洲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357。

返，國事漸非，士大夫改革弊政的訴求日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臺閣文學的領導地位進一步動搖，到了正德間，終於被標榜「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師古說所取代。<sup>3</sup> 進而言之，早在臺閣文風興盛的宣德、正統之時，就有師法秦漢者出現了。其後近百年間，主此說者雖為數寥寥，卻不絕如縷。而考其籍貫，又以吳中文士為主。

明代所謂吳中，主要指蘇州府所領的一州七縣——即太倉州和長洲、吳縣、崑山、吳江、常熟、嘉定、崇明。而廣義的吳中，更可涵蓋整個江南地區。<sup>4</sup> 晉室、宋室兩次東渡，江南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元末群雄蜂起，泰州張士誠（1327—1367）割據姑蘇，蘇南一帶遂

---

<sup>3</sup> 按：明代文學的師古說有廣狹兩義。廣義的師古可以涵蓋明初主張文道合一的宋濂、標舉唐音的閩中十子、文主歐曾詩尊王孟的臺閣諸臣、以及李東陽的茶陵派、李何王李等前後七子、王唐歸茅的唐宋派，以至明末陳子龍諸人的主張。而狹義的師古派，大抵只限於明代中葉以降，前、後七子的文學主張。所謂「明代前期」，上及洪武開國，下以弘治、正德間為限。由於本文所討論以吳中文士為代表的師古說先驅者是站在臺閣作家的對立面、補充面而出現的，而臺閣文風獨盛的時代又是在永樂至弘治間的一百年，故本文所探析的師古說先驅者並不包括洪武、建文時代的宋濂、方孝孺等文道合一論者。

<sup>4</sup> 按：如范宜如論云：「……楊維禎，自稱『會稽楊維禎』，會稽不屬於蘇州，但若以『吳中』為範疇則又可納入討論。」見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頁17 - 18。

能享有比較安寧的局面。然入明伊始，吳中地區遭遇到重大的變故。《明史·食貨志》稱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時：

惟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時蘇州一府……官糧歲額與浙江通省相埒，其重猶此。<sup>5</sup>

王衛平就此而論道，處於政治高壓下的文人們，內心充滿了壓抑和痛苦。這種心理特徵在吳中詩壇表現得尤為顯著。<sup>6</sup> 明太祖出於私憤，同時為了摧抑文人的氣焰，對於這些吳中文士進行了殘酷的打擊：高啟（1336—1374）腰斬於市，楊基（1326—1378）謫輸作而卒於工所，張羽投江以死，徐賁（1335—約1393）下獄瘐死，王行（1331—1395）坐藍玉獄死，袁凱（約1316—）佯狂免歸，遭遇之悲慘，史無前例。但自洪武朝開始，會試報捷者即以吳人為多；而永樂以降，徐有貞（1407—1472）、吳寬（1435—1504）、王鏊（1450—1524）等，都改庶吉士入翰林，與臺閣文風關係密切。至於未獲功名而以詩鳴世者也為數不少，像沈周（1427—1509）、祝允明（1460—1526）、唐寅（1470—1524）、文徵明（1470—1559）等皆是。而顧璘、徐禎卿等，更列名前七子之間，成為明代中

<sup>5</sup> [清]張廷玉主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頁1896。

<sup>6</sup> 王衛平、王建華：《蘇州史紀(古代)》（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167。

葉師古說的主將。

陳書祿將吳中文士視為由元末楊維禎（1296–1370）向李贄（1527–1602）、袁宏道（1568–1610）等過渡的橋樑，<sup>7</sup> 從師心的角度論及楊維禎與吳中文士的傳承關係。實際上，楊氏既倡師心，又尚師古，<sup>8</sup> 兩種主張早在明代中葉以前都已得到了吳中文士的繼承。簡錦松認為，吳中文士偏重鄉土，易於排拒外來思想，<sup>9</sup> 且形成了「博學」和「尚趣」的傳統。<sup>10</sup> 尚趣近乎師心：如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都以其清雅脫俗的生活方式見稱於世。博學主於師古：徐有貞學問博雜；吳寬詩文雖「未

<sup>7</sup> 陳書祿：《明代詩文的演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166。

<sup>8</sup>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初版），下卷，頁124。

<sup>9</sup>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初版），頁90。

<sup>10</sup> 同上註，頁88。案：如四庫館臣稱徐有貞「究心經濟，於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幹略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坌涌，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辯……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不醇，於是可見；才氣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見」。〔清〕永瑤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初版），頁1487。〕此博學之例。沈周「以畫名一代，詩非其所留意，又晚年畫境彌高，頽然天放，方圓自造，惟意所如。詩亦揮灑淋漓，自寫天趣，蓋不以字句取工，徒以棲心邱壑，名利兩忘，風月往還，煙雲供養，其胸次本無塵累，故所作亦不凋不琢，自然拔俗，寄興於町畦之外，可以意會而不可加以繩削」。〔同前，頁1489。〕此尚趣之例。

脫館閣之習」，<sup>11</sup> 而「深厚穠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sup>12</sup> 王鏊則好韓愈之文，<sup>13</sup> 與臺閣先輩宗歐之習大為不同；祝允明「所尊而援引者《五經》、孔氏；所喜者左氏、莊生、班、馬數子而已。下視歐、曾諸公，蔑然也。」<sup>14</sup> 隨著時間的推移，博學、尚趣的文學取向遂自吳中而波及全國。如此看來，吳中文士也可視為楊維禎向前後七子過渡的橋樑。

范宜如據《明史·文苑傳》、錢謙益(1582-1664)《列朝詩集小傳》及〈袁永之文集序〉歸納，明代吳中文壇初盛期為元末明初，極盛期在成化、弘治年間，衰退期在隆慶、萬曆年間。<sup>15</sup> 可見吳中文壇的活躍年代，大率與臺閣文風的興盛期平行。出於對時文的不滿，吳中文士間出現過以古文辭創作為主的文學群體，一直保持著與臺閣諸臣相異的文學風氣。而此師古風氣的一項重要特徵，就是對《楚辭》異於主流的

---

<sup>11</sup>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楚辭學批評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81。

<sup>12</sup> [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550。

<sup>13</sup> 如其言云：「《六經》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後世有作，其無以加矣。〈原道〉等篇，固為醇正……其他若〈曹成王南海神廟〉、〈徐偃王廟〉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變化也！」見[明]王鏊：《震澤長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867-213。

<sup>14</sup> [明]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初版)，頁37。

<sup>15</sup>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頁39。

詮釋。由於屈子思想與儒家不盡相同，《楚辭》受到了道學家和臺閣官員的抨擊。如成化間，何喬新（1427-1502）重刊朱註作序，認為《楚辭》作為辭賦之祖，導致後世文人捨質逐華、為文害道。只有經朱子刪註，《楚辭》方才大義昭然，讀者可以放心閱讀了。<sup>16</sup> 這樣的主流意見在明代前期的影響是很大的。然而，吳中文士卻並非如此。生活於永樂至正統間的吳訥（1372-1457），追摹古風而作《文章辨體》，有專卷論述《楚辭》，引起可觀的反響。其後，上至臺閣中人徐有貞、吳寬、王鏊等，下至沉淪下僚的桑悅（1447-1513）、祝允明等，都頗為鮮明地表露出師古說的取向，這種取向在他們的《楚辭》論中尤能體現。<sup>17</sup>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吳中籍的官員如劉昌（1424-1480）、葉贊（？-1512）等，已逐漸走出道學的陰影，醞釀出新的文學見解，對《楚辭》推崇不已。總而觀之，吳中文士《楚辭》論的內容雖然有限，卻可較完整地反映出這個時期師古說的面貌。當學者逐漸就《楚辭》醞釀出不同的見解，

<sup>16</sup> [明]何喬新〈楚辭序〉：「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詠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淒然興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見《椒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49-138至1249-139。）

<sup>17</sup> 按：明代前期的吳中文士對於《楚辭》的論述頗具價值，但除吳訥外，所言大多未形成體系，不足以稱為「楚辭研究」，故本文只以「楚辭論」名之。

便意味著臺閣體權威的日益消滅。正德、嘉靖以還，前後七子作文論文，提倡超越唐宋而直法秦漢，明代前期的吳中文士實為其前鋒。故此，本文擬探討永樂至弘治間吳中文士的楚辭研究，以見臺閣文風與師古說此消彼長的過程。<sup>18</sup>

## 一、《楚辭》與明代前期吳中文士的心態

### (一) 矢志文士

學者一般認為，不論在地理環境、政治氣候還是文化心態上，吳中與北京都比較疏離。故此，當臺閣體、性理詩流行天下時，吳中文風沒有受到大的影響。而陳書祿說：「在吳中地區熱衷科舉的氛圍中，才華出眾的祝允明、唐寅和文徵明等人也素有『繼起高科，傳掌帝制』的強

---

<sup>18</sup> 按：本文所選取的討論對象如徐有貞、劉昌、沈周、吳寬、桑悅、王鏊、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係據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版）。此外，如吳訥、葉贇等之名，雖不見錄於錢書，然其文學思想實亦淵源於吳中，故本文有專節探析。此外，如註4范宜如所言，明代吳中文壇的活躍期在弘治以前；林賢得則將明代中葉吳中文壇分為弘治壇分為弘治正德及嘉靖隆慶兩期。（見林賢得：《明代吳中詩派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頁1。）總而觀之，吳中文壇的衰落，大抵與臺閣文風的衰落、前七子的興起同時。本文所論某些吳中文士如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人的生活年代已經下達嘉靖之世。然其主要活動年代仍在弘治朝及以前，且保存了彼時的文學特色，故一併論之。

烈願望。」「如果他們不是中途迭遭挫折，而是順其發展，也很有可能走上科舉入仕、奉儒守官的道路。」<sup>19</sup> 范宜如則指出，文徵明與祝穆、祝允明、唐寅、錢孔周、顧春潛等均有志於古文辭之創作。<sup>20</sup> 可見他們的放蕩不羈、率性自然，主要緣於個人的得失。這些矢志吳中文士承襲了楊維禎師古、師心並存的文學主張，而他們在師古上的差異可以從其對於《楚辭》的態度上呈現出來。

第一類態度是引屈子為知己，或藉《楚辭》抒發內心的不平，如桑悅、祝允明等。桑氏於成化元年(1465)中舉，但三次會試皆遭罷黜。<sup>21</sup> 因個人遭遇之故，桑悅對《楚辭》的十分推崇。在往赴長沙任通判的途中，桑悅曾作〈吊屈原文〉，氣格高婉，有楚騷遺意。桑悅曾註《楚辭》，是明代第一部楚辭學專著。此書未曾付印，今已不傳，片段猶存於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如其評〈惜誦〉道：「迷不知寵之門句，竟寫出一個桑判官。」<sup>22</sup> 以《騷》註我的心態非常強烈。而祝允明〈九歌圖記〉則云：

以詞賦不遇者靈均，以詞賦遇者長卿。長卿視屈猶子視父也。蓋

<sup>19</sup> 陳書祿：《明代詩文的演變》，頁169。

<sup>20</sup>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頁52。

<sup>21</sup> 見[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452-318。

<sup>22</sup> [明]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天啟六年(1626)刊本)，卷四，頁2b。

才為時低昂如此。今士生盛世，苟抱一藝必庸焉，至有獵極華要者，尚何云遇不遇哉！<sup>23</sup>

所謂「以詞賦不遇」，僅將屈子以文人視之。這無疑是祝氏個人心理的投射。至於「苟抱一藝必庸」，更是因自己鬱鬱不得志而抒發的牢騷。

第二類態度是：固然予屈子以同情，卻刻意保持著一段心理距離。如沈周題屈原像道：

逐跡惶惶楚水長，重華雖遠未能忘。魯無君子斯當取，殷有仁人莫救亡。魚腹何勝載憂怨，鳳笈終不蔽文章。忠貞那得消磨盡，蘭芷千年只自芳。<sup>24</sup>

此詩肯定了屈子的道德和文章，全篇縱使帶有激越的情調，卻不失清雅。抑有進者，由於「尚趣」傳統的影響，失志的吳中文士在放任個性之外，也追求閒適自足，這就與屈騷的內涵、情調大相逕庭了。試看文洪（1465年中舉）的〈對菊〉詩：

---

<sup>23</sup> [明]祝允明：〈九歌圖記〉，《懷星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60—701。

<sup>24</sup> [明]沈周：〈屈原像〉，《石田詩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49—331。

蓐收肅霜威，草木咸凋瘁。睇玆東籬叢，孤芳可人意。迎風散奇芬，浥露含幽思。吾生抱孤僻，玆焉獨云契。醉誦〈離騷經〉，閒詠柴桑句。外慕苟不羈，蕭然有真味。<sup>25</sup>

驟眼看來，文洪似乎沿襲了魏晉名士飲酒讀《騷》的意趣。但仔細玩味全詩，「柴桑句」的情調遠遠濃厚於〈離騷經〉。竹林七賢也好、陶潛也好，他們內心深處都積鬱著對現世的不滿，所謂逍遙物外只是一種掩飾。文洪對於竹林七賢和陶潛的追慕或許同樣是對於仕途不遇的掩飾，但詩中所流露對生活的怡然自得，卻與陶潛等人大為不同。至於唐寅、文徵明等人，則遍蒐全集而幾無一語論及《楚辭》。

吳中矢志文士對於《楚辭》看似有兩類態度，實際上只是同一種心態的兩個側面。一樣是仕途不順，激憤時文章就化為牢騷，他們對於《楚辭》及其他秦漢文字的推舉，殆出於自對臺閣文學主張的逆反心態。至於心情平伏時，他們就轉求意趣，進行逃避。由於各人性格的差異，顯現於文字上的內容遂有不同了。

---

<sup>25</sup> [明]文洪：〈對菊〉，《文涑水集》（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明刻本，1997初版），頁集39-198。

## (二)臺閣文人

失志的吳中文士對於《楚辭》的態度雖有小異，主要緣於個人遭遇和文學主張。而身居臺閣的吳中文士對於《楚辭》的評價就更為謹慎。正統間，徐有貞論〈招魂〉道：

禮於始喪有復，復之流為招魂，其來尚矣。楚人乃以施之生者。而推其緣起，實則行乎死者之事焉。夫惟行乎死者，故其為辭涉於神怪。自宋玉景差之作，猶不免乎鄙野之譏，況其後者歟！然則後之作者，蓋必微其辭而約之禮可也。<sup>26</sup>

徐有貞所言「復之流為招魂」、「招魂之禮不專為死人者」、二〈招〉作者分別為宋玉、景差，這幾點都是遵從朱子的。至於二〈招〉涉於神怪，他認為受招者既為死人，所以無可厚非；然而其中娛酒不廢、士女雜坐的「荒淫之志」，還是聲言要「務必去之」。徐氏雖然學術博雜，但對《楚辭》的評價還是合乎臺閣重臣的分寸。再如吳寬〈題九歌圖後〉，<sup>27</sup> 借題跋的機會對〈九歌〉十一篇的現象提出了疑問。然而他始終相信

<sup>26</sup> [明]徐有貞：〈招拙逸詞序〉，《武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45-148至1245-149。

<sup>27</sup> [明]吳寬〈題九歌圖後〉：「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後人既無容贅詞，則有為九歌圖者。其初蓋出於李龍眠，人從倣之。此本則崑山許君鴻高所藏也。圖後各繫其歌。許君謂為其鄉先輩朱季寧中書之筆。予觀之，信其書之妙，猶有晉唐人遺意也。歌名九，其為章實十有一，《楚詞辨證》

《楚辭》大義已盡發於朱子，因此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深究。從徐有貞、吳寬對〈招魂〉、〈九歌〉的論述中，我們雖看到明代考據學之萌芽，也從字裡行間感受到政治、道學的雙重壓力。

這種情況一直到正德年間才有了根本的改變。當時王逸《楚辭章句》得以重梓面世，王鏊作為文壇耆宿，欣然為此書命序。<sup>28</sup> 其序的內容可以歸結為三端：

- 一、王逸重訓詁，朱子重義理，因此《章句》文義較破碎，不及《集註》脈絡清晰。
- 二、〈天問〉、〈招魂〉等篇，引用了大量典故。如果不一一註明，文理根本讀不通。故在註解這些篇章上，《章句》有一日之長。
- 三、《集註》雖然闡明了《楚辭》大義，但不少舊說都是因《章句》而參訂折衷的；而《章句》本身，也一定保留了不少劉安、班固、

---

亦以為不可曉，至於〈禮魂〉則畫家所不能及者，故其圖缺云。」見《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55-462至1255-463。

<sup>28</sup> 見[明]王鏊：〈重刊王逸註楚辭序〉，《震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256-280至1256-281。

賈逵的舊說，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王鏊從文學和文獻學的角度審視、比較《章句》和《集註》，追溯了二者之間的關係，肯定了前者的優點，也對後者神化了的地位提出了質疑。王逸《章句》的復出標誌著明代楚辭學走出了朱註獨尊的時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同時也反映出臺閣文風漸趨沒落的實況。

## 二、楚辭學專論：吳訥《文章辨體》

如前文所言，在臺閣文風興盛的宣德、正統時期，常熟人吳訥就採輯先秦至明初的詩文而編錄《文章辨體》五十卷、外集五卷。此書仿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元祝堯《古賦辨體》之例，正如彭時〈文章辨體序〉所云，「蓋有以備《正宗》之未備而益加精焉者」。<sup>29</sup> 而從近處觀之，此書未必不受楊維禎、高啟等人師古主張的影響。彭時解「辨體」之義云：

辨體云者，每體自為一類，每類各著序題，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確，一本於先儒成說，使數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一覽可以具見。

---

<sup>29</sup> [明]彭時：〈文章辨體序〉，[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初版），頁7。

就形式和內容來說，是在正文前面以序說的方法逐一辨析各種文體的制  
作之意。因此《文章辨體》一書卷帙雖富，所收錄的作品也有簡註，但  
學者稱道的則在其序說部分。茶陵派程敏政（1445—1499）所編《明文  
衡》即收有《文章辨體·序說》，<sup>31</sup> 臺閣作家陸深《谿山餘話》以此書  
號為精博，自真德秀以下未有能過之者。<sup>32</sup> 甚至晚明主張師心自用的公  
安派領袖袁宗道，對《文章辨體》亦多有稱譽。<sup>33</sup>

吳訥為吳中士人，永樂中以醫薦至京，並非從科舉途徑出仕，論文  
較少受道學桎梏；加上博覽群書，故能在沖融演迤的文學風氣下獨鳴師  
古。其論文之旨，悉在《文章辨體·序說》：文辭以體製為先，作文以  
關世教為主，命辭固以明理為本。<sup>34</sup> 「作文關世教」是切合當時的科舉  
政策，「命辭以明理」是切合當時獨尊的道學，但這兩點都是次要的。

<sup>30</sup> 同上註。

<sup>31</sup> 見[明]程敏政：《明文衡》（臺北：世界書局據明刊本影印，1967年初版）。

<sup>32</sup> [明]陸深：《谿山餘話》（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影印初版），  
頁22。案：或有學者將陸深歸為前七子的羽翼。然四庫館臣論其「當正、嘉  
之間，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見[清]永  
瑛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1500。）可見陸深創作仍是臺閣風格。

<sup>33</sup> [明]袁宗道：〈刻文章辨體序〉，《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初版），頁81。

<sup>34</sup> [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頁9。

只有「文辭以體製為先」才是《文章辨體》的主旨與吳氏師古說的核心。

《文章辨體》分文體為五十九類，第二類即古賦。此類主要參考了朱子和祝堯的研究成果，加以融會貫通，出以己意，以時代為序，分為楚、兩漢、三國六朝、唐、宋、元、明等卷，<sup>35</sup> 而以《楚辭》居首。不過，荀子〈成相〉、〈俛詩〉等作品，吳訥沒有如朱子、祝堯那樣列入賦類，而是附於〈古歌謠〉之後。<sup>36</sup>

### (一)《楚辭》的本源

對於《楚辭》的體製，吳訥作了詳盡的論說。有關其本源，吳訥引

---

<sup>35</sup> 吳訥云：「屈宋之辭，家藏人誦。兩漢以下，祖襲者多。晦翁編類《楚辭後語》，一以時世為之先後。至其體製，則若詩、若賦、若歌、若辭、若文、若操，與夫諸雜著之近乎楚者，悉皆間見迭書，而不復為之分類也。迨元祝氏輯纂《古賦辨體》，其曰〈後騷〉者，雖文辭增損不同，然大意則亦本乎晦翁之舊也。是編之賦，既以屈宋為首；其兩漢以後，則尊祝氏，而以世代為之卷次。若當時諸人雜作，有得古賦之體者，亦附於各卷之後，庶幾讀者有以得夫旁通曲暢之助云。」同上註，頁21。

<sup>36</sup> 吳訥云：「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按：即《漢書·藝文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俛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俛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信哉！」同上註，頁19 - 20。

祝堯《古賦辨體》道：

按屈原為〈騷〉詩，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為讀，遂為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於是焉。<sup>37</sup>

他認為楚聲如〈漢廣〉、〈江有汜〉，在《詩三百》中已冠於〈國風〉之首。其後風雅雖變，楚聲之體稍易，卻仍能保存古詩的溫柔敦厚之義。屈子繼承這個傳統，發憤抒情，其作雖不以賦名之，實際上卻是賦家之祖。由此可知，吳氏相信《楚辭》不僅稍變《詩三百》之文體，且繼承了詩人「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六義。

但是，吳訥也清楚意識到《詩三百》與《楚辭》的不同之處。他通過對風、賦、雅、頌、騷、辭諸先秦兩漢文體的界定而表達出這一點來：

夫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摘華布體謂之「賦」；

---

<sup>37</sup> 同上註，頁20。

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  
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傷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辭」。

38

若從「正變」的角度來看，吳訥有關風、賦、雅、頌的描述非常傾向於「正」的一端：風有「刺」，卻說是「緩而不迫」；雅能言政治之「失」，卻稱為「正言」。然而，此論與其說是淡化了風雅正變的區別，毋寧說是要強調《詩三百》與《楚辭》間的異同。風有「刺」，也「寓之比興」，但不像騷之「幽憂憤悱」；雅言得失，也「托於文章」，但不像辭之「感傷事物」。<sup>39</sup> 可見吳訥雖不否認《楚辭》源於《詩三百》，卻認識到二者不同之處就在於《楚辭》有幽憤感傷的情調。這種情調不合乎中庸之道，為朱子等宿儒所詬病。吳訥雖也強調「教化」、「明理」，但此處只是就文論文，並沒有上綱上線地責難屈子之狂狷。這在明代前期是難能可貴的。

## （二）《楚辭》的流裔

吳訥相信《楚辭》為古賦之祖，律賦為古賦之變。《詩三百》只有

---

<sup>38</sup> 同上註，頁12。

<sup>39</sup> 按：吳訥將《楚辭》的作品分為「騷」、「辭」兩類，蓋承自《文選》的分類法。然觀其對「騷」、「辭」的界定非常接近，分為兩類，實屬不必。

風、雅、頌三體，賦在當時只是一種寫作手法。但回觀前引《文章辨體》對各種文體的定義，竟將賦躋於其間。可見班固「賦者古詩之流」的說法，吳訥是贊成的。不過，他並未因此遽言賦直承於《詩》，而是確認二者之間還有《楚辭》這一環。吳訥引《漢書·藝文志》曰：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以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子，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sup>40</sup>

申明了詩—騷—賦的演變途徑，也提到賦與騷最不同之處，在於「風諭之義」的淹滅。換言之，屈騷尚能得《詩》之精神，而宋玉等人的賦徒具《詩》的寫作手法而已。持此而觀，吳訥對於前人的編選體例有不滿之處：

《文選》編次無序，如第一卷古賦以〈兩都〉為首，而〈離騷〉反置於後……不足為法。<sup>41</sup>

他認為《文選》置古賦於前、列騷於後，昧於二者之間的源流關係，甚

<sup>40</sup> 同上註，頁19—20。

<sup>41</sup> 同上註，頁9。

不可取。因此《文章辨體》中，吳訥將三類文體一概劃入古賦類。

由前處引文可見，吳訥不僅注重文體的源流，同時也認為文體的特色直接影響到其功能。就《楚辭》而言，他還有進一步的發揮：

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詠性情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sup>42</sup>

早在西漢末年，揚雄就指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在二者之外，吳訥又益以騷人之賦。比對可知，吳訥的騷人之賦，其實相當於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這樣一來，吳訥的詩人之賦，所指只可能是《詩三百》中的運用「賦」這種手法的段落；他將賦與風、雅、頌並列，自有其因。吳訥認為，詩、騷、詞人之賦的演化在於文辭與義理此消彼長。古詩質樸，有美刺諷諫之意；漢賦華贍，勸百而諷一；而《楚辭》則辭義兼具。其情不自知而發於情，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正是因為有得於「在心言志、發而為詩」之義，而不像後世賦家刻意為文，斲喪天

---

<sup>42</sup> 同上註，頁20至21。

真。再者，雖然《詩》、《騷》同秉六義，但因時代的變化，六義在作品中體現的面貌又有所不同。朱子對這一點可謂剖析毫芒，<sup>43</sup> 吳訥則全盤接受了朱子的意見。

### 三、收藏與抄寫：吳中文士對《楚辭》的接受情況

吳中文士對於《楚辭》的喜愛，並未因道學的獨尊、臺閣文風的盛行而受到太大影響。首先，我們可以從楚辭學著作的收藏方面來看。正統四年，楊士奇等奉敕清點皇家藏書，編纂成《文淵閣書目》。目中僅收有《楚辭》、《楚辭注解》、《續楚辭》、《變離騷》、《古賦辨體》等幾種，<sup>44</sup> 為數並不算多。相形之下，吳中所收藏的楚辭學著作，頗為引人注目。如崑山葉盛（1420—1474）在《水東日記》中概述了自己收

---

<sup>43</sup> 朱子云：「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托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見[宋]朱子《楚辭集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頁10至11。

<sup>44</sup>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影印初版），頁79至80。

錄南宋高元之《變離騷》的情況；正德十三年刊《楚辭章句》的底本，便是蘇州黃省曾所藏；常熟桑悅在成化年間完成的《楚辭註》稿本，也一直在吳中一帶流傳。另一方面，正統、成化間書法家對《楚辭》的愛好似乎形成了一種風氣。葉盛、何喬新分別留下了〈寫騷亭記〉和〈寫騷軒記〉。除表露出個人的文學好尚外，更關涉時人對《楚辭》的論爭。本節中，筆者會分別以高元之〈變離騷序〉、葉盛〈寫騷亭記〉、何喬新〈寫騷軒記〉三文為例，分析永樂以後、前七子興起前的吳中文士對《楚辭》的接受情況，以見臺閣文風逐漸衰落後，文學師古思想在明代前期的萌蘗。

#### (一)高元之〈變離騷序〉

正統、成化間館臣葉盛，是當時臺閣作家的代表人物。《明詩話全編》稱葉氏論詩本乎儒家詩教，但同時也強調藝術上蘊籍含蓄、有餘味可詠。<sup>45</sup> 明代中葉以後，馮紹祖《觀妙齋楚辭章句》、陸時雍《楚辭疏》等著作的集評部分皆錄有葉盛有關《楚辭》的一篇文章。此文筆觸犀利，詞鋒激切，殊不類臺閣文風。究其大旨，有三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戰國之世，變風已亡。屈子處昏君亂臣之間，古道獨存，竭忠 盡  
智，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而屈作二十五篇，都是源流於六義，

---

<sup>45</sup> 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初版），頁1287。

出於不能自己、眷眷無窮的思治、愛上之心。故其憤悱愁痛之餘，卻並沒有彰顯君惡、另適他國。

二、屈子之作，以忠君愛國、殺身成仁為主旨。且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後世不明白辭以意為依歸，僅以模仿其麗語華藻為能事，可謂本末倒置。

三、歷來評論《楚辭》者，如揚雄、班固、王逸、劉勰等人，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而創作者自宋玉以下，都只是紬繹緒言，相與嗟詠，於屈子的微言匿旨卻不能有所建明。<sup>46</sup>

南宋時，洪興祖、朱子都曾對前人的意見作出審視。洪興祖以揚雄的襟抱不及屈子，班固、顏之推所言乃妾婦兒童之見，對屈子作出了無條件的讚美。<sup>47</sup> 朱子雖然大致贊成洪興祖的說法，但因屈子的行為不合於中庸之道而始終有微辭，又目屈子為忠而過、過於忠，以屈辭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而此文則予屈子人格以至高無上的評價，認為正是屈

---

<sup>46</sup> 見[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明馮紹祖萬曆丙戌刊本，1974年再版），頁547至551。

<sup>47</sup>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重印修訂本），頁51。

子之作扭轉了戰國風雅寢聲的局面。這些議論幾乎都是針對朱子而發的。

然而查葉盛《水東日記》，方知馮紹祖、陸時雍之書大有問題。據《水東日記》之言，葉盛得到一套南宋高元之所著《變離騷》殘本，遂將此書的序言收入《水東日記》之中。<sup>48</sup> 而馮、陸收錄的所謂葉盛之語，實為高元之的〈變離騷序〉。查《續文獻通考》及《浙江通志·經籍考》，皆著錄有南宋高元之《變離騷》九卷。其書今不復見，殆已亡佚。因此，《水東日記》所錄〈變離騷序〉非常珍貴。<sup>49</sup>

葉盛藏書在當時甚為知名，有《菴竹堂書目》。惜此書已亡，今日所見乃坊賈據《文淵閣書目》刪削而成的偽本。葉氏所藏楚辭學著作的整體面貌雖已不得而知，不過仍可據《水東日記》之言窺見一斑。在南宋尊崇道學的環境下，高元之不以朱子之是為是，將《楚辭》放在獨立的位置進行評價，實屬鳳毛麟角。而在道學獨大、楚辭學沉寂的明代前期，身居臺閣的葉盛竟在自己的著述中毅然錄入這篇「離經叛道」的文字，也可謂一大異數。因此，儘管〈變離騷序〉是南宋的作品，但在明代一直被視為望重士林的葉盛之作，它對於楚辭學者的影響，可以想見。

---

<sup>48</sup> 見[明]葉盛：〈高元之變離騷〉，《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初版），頁239至241。

<sup>49</sup> 按：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紹騷隅錄》僅存此書之目，未有抄錄〈變離騷序〉。

## (二) 葉盛〈寫騷亭記〉

葉盛除收藏《變離騷》外，還曾作〈寫騷亭記〉一文。從這篇論難體的文字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正統間的吳中文士劉昌、葉盛對於《楚辭》的推重，還可以了解當時貶斥《楚辭》的原因何在。篇中主角工部郎中劉昌(欽謨)乃蘇州人，酷愛《楚辭》，在金陵建了一座寫騷亭，請葉盛作記。<sup>50</sup> 這時有人詰問劉氏道：

《離騷》者，楚狂不得於君之說耳。非聖君賢相之所幸聞，純儒莊士之所樂道。今皇明開天，累洽重熙，上焉有堯舜之君，下焉有皋陶伊傅周召之臣，朝無闕政，野無困窮，何事乎《騷》？且子東南一夫，明聖人之經，學聖賢之學，策名賢科，發身郎署，由郎而遷大夫，縮銅章，坐公府，志之所向，職之所及，可以畢

<sup>50</sup> 按：〈寫騷亭記〉僅以欽謨之字稱劉氏，並未紀錄其本名。《明人傳記資料索引》據焦竑《國朝獻徵錄》等云：「劉昌，字欽謨，號櫻園，長洲人。正統十年進士，為文瞻麗，詩宗盛唐。官至廣東參政，卒年五十七。有《中州名賢文表》、《河南志》、《姑蘇志》、文集等。」見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再版)，頁835。參[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97年初版)，頁史102-608。又《蘇州府志》則謂劉昌有《胥臺稿》、《鳳臺稿》、《金臺稿》、《嵩臺稿》、《越臺稿》、《中州文表》、《懸笥瑣探》等書；又有《姑蘇志》，且嘗類明朝文章如《文選》《文鑑》，皆未脫稿。見[清]李銘皖編：《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緒九年刊本)，頁1946。

答而無滯，好爵在前，彼時子取。而子又嘗納文於館閣，執筆蒞史官，定千載之是非，擅天下之才譽，又何事乎《騷》？不觀於子乎？著書滿家，亦為文章，上窮乎未始有形之前，旁搜乎八極茫茫之外，廓皇王之詞賦而不為，議唐宋之釋經有未至矣，其又何事乎《騷》？<sup>51</sup>

詰者從道學、政治兩個層面，對劉昌愛《騷》的癖好提出了質疑：《楚辭》是朝有闕政，野有困窮的衰世之音，不合於「累洽重熙」的當今；而屈子不得於君，遂行吟澤畔，顯暴君惡，也不合儒家忠君之旨。實際上，明代前期楚辭學沉寂的主要原因，就在於道學的獨尊和皇權的膨脹。而劉昌對於詰者也有一番爭辯：

夫《離騷》以經言。經，常道也。屈子知天倫大綱之重，懾天下萬世之譏，忠君愛國，出乎至誠，其為言宜無愧於君臣。無愧於君臣，斯無忝於《六經》。《六經》言經，《離騷》亦言經，非僭也，宜也。《六經》出於群聖人，成於孔子，而明於朱子。朱子於經書未輯也，禮樂未備也，吾孔子之《春秋》未有所屬也；而汲汲於《離騷》是箋是正者，豈無謂也哉！夫聖至於堯，其亦至矣！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謂為堯之虛器，可乎？然則君臣之義，諫爭之道，其可廢乎？其不可廢乎？設使《離騷》不作，則屈子之心必不白，忠諫之路必不通，而揚子雲龍蛇之說必行。其

---

<sup>51</sup> 見[明]葉盛：〈寫騷亭記〉，《葉文莊公全集·水東稿》，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輯。同註45，頁1300 - 1301。

說既行，則天下揚子雲，後世揚子雲將不勝其多，天理由之而滅絕，人紀以之而廢壞，生靈受弊，莫可援救，其如聖人作經以教萬世之意何？朱子於此，蓋亦有不得已者矣。<sup>52</sup>

總括劉昌的回應，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離騷》本稱為經，而這是得宜的，並非僭越。屈子忠君愛國，出乎至誠，為言宜無愧於君臣，無忝於《六經》，知倫綱之重，所以合於常道。

二、朱子尚未遍註六經，就汲汲於箋正《楚辭》，其中有深意在焉：屈子的行徑，千百年來都遭到世人的誤解。像揚雄等人大節有虧，而敢詆訾屈子。如果不註《騷》以正視聽，則眇眇來世，非議屈子者尚不知有幾。

三、屈子所謂「顯暴君惡」，只不過是正言直諫而已。即使唐堯也要設置諫鼓謗木，可見即使聖人在位也會出現闕失，更何況楚懷王般的昏君。因此，對屈子的肯定，就是對士人氣節的肯定。

整體來看，劉昌的語氣比較平和，也沒有從詞章方面強調《楚辭》的價值。然而，他故意由道學和政治的角度出發，根據〈離騷〉稱經、朱子註《騷》和唐堯納諫幾點來論證《楚辭》的重要性、增強屈子的正統性，這自然更容易為當政者與道學家們所接受。對於劉昌的意見，葉盛沒有作出任何的補充和指斥。他稱許劉氏道：「眾囂囂兮，而子獨《騷》兮。」其欣然命筆，不僅表達了完全贊同的意見，還要藉此一並「曉夫

---

<sup>52</sup> 同上註。

詰者」，可知對《楚辭》的態度卻非常正面。葉盛、劉昌對《楚辭》的評價，揭示了吳中文士如何漸次將師古文風帶入臺閣。

### (三)何喬新〈寫騷軒記〉

何喬新的〈寫騷軒記〉寫於成化間，與葉盛〈寫騷亭記〉一樣，也是論難體。文中有「客」、葉贇(崇禮)、何喬新三人，各自對《楚辭》發表了意見。<sup>53</sup> 刑部主事、淮安人葉贇愛《騷》，公暇諷詠，染翰而寫之，更將燕居之所題為「寫騷軒」。此名引來了「客」的詰問：

騷，古詩之流也。三百篇之詩，吾夫子刪之以垂訓，與《易》《書》《春秋》《禮記》並列為經矣。《離騷》，風雅之再變者也。揚雄反之，班固譏之，端人莊士或羞道之。今子舍聖人之經而《騷》是寫，無乃先其末而後其本，志其小而遺其大者邪？<sup>54</sup>

「客」雖然承認《楚辭》是古詩之流，但卻援引揚雄、班固、朱子之說，

---

<sup>53</sup> 按：〈寫騷軒記〉僅以崇禮之字稱葉氏，並未紀錄其本名。《明人傳記資料索引》據焦竑《國朝獻徵錄》云：「葉贇，字崇禮，山陽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屢陞郎中，鞫獄明慎，人稱不冤。出知嘉興府，改台州、廣信，以採履清謹聞，仕終刑部侍郎，正德七年卒。」見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參[明]焦竑：《國朝獻徵錄》，頁史102-416。

<sup>54</sup> 見[明]何喬新：〈寫騷軒記〉，同註16，頁1249-225至1249-226。

以為《楚辭》不合於經，葉贇愛《騷》寫《騷》，實在捨本逐末。此論與〈寫騷亭記〉詰者之言很接近，在明代前期非常典型，無疑出自道學家之口。然而，葉贇的回答可謂慷慨激昂：

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屈平者乎？原之為人也，其志潔，其行廉，其材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使其遇明王聖主而為之宣力，則股肱之良佐已。不幸前遇懷王，後遇襄王，懷瑾握瑜，而世莫之知平。王所詫同德者，蘭與蕙耳。然或變而不芳，或化而為茅，況揭車胡繩之瑣瑣者耶？愁吟澤畔，徬徨江濱，獨抑鬱無誰語，而《離騷》之詞作焉。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原者乎！《三百篇》之詩，聖人之經也；《離騷》非聖經之羽翼耶？故吾於講經之餘，惓惓於《騷》，諷之詠之，又從而寫之，而不能已焉。世之不自知者，或薄原而不為，然一武夫氣勢，稍能動人者，則奔走其門而不恥，視原之不阿子蘭，何如也？其或忤於世而困頓焉，則終身懲創而不自振，視原之九死不悔，又何如也？彼揚雄屈節於篡賊，班固失身於戚畹，皆原之罪人也，其論議予奪，又奚足為輕重哉！嗚呼！孰若原者，吾願從之，垂蓉佩，被荷衣，徜徉懸圃，以邀以嬉，俯視雄固之徒，奚畜醜雞之紛飛邪？<sup>55</sup>

---

<sup>55</sup> 同上註。

葉氏認為屈子懷瑾握瑜，志潔行廉，如果遭逢明主，一定大有作為，然而先遇懷王，後遇襄王，窮困以終，這是為人臣者最大的悲哀。而屈子在窮愁中所作的篇章，正是聖經的羽翼，決不可以有失中庸目之。屈子與聖人相比也許等而下之，但像揚雄、班固之徒，本身大節有虧，視屈子不啻霄壤。他們竟敢妄加指點，混淆視聽，實三閭之罪人。觀葉贊身居高位，並非鬱鬱失志者；還要負責經筵講習，對道學也應素養深厚。因此在當時看來，他對《楚辭》的喜好就甚為古怪了。何喬新得知此段爭執，發出了這樣的議論：

崇禮潔廉好修，有契乎原之心，其詞瑰麗可喜，有得乎《騷》之體，宜其於原慕之深也。雖然，原之作《離騷》，豈慕不遇而死哉？時之不遇也。今天子盛明，屏讒佞，進忠良。崇禮適際斯時，所遇非原比也。推潔廉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瑰麗之詞而歌詠太平，則與原殊跡而同心也。崇禮勉乎哉！<sup>56</sup>

何喬新以為葉贊愛《騷》，是由於其人潔廉好修、文辭又瑰麗可喜，近於屈騷之故。換言之，何喬新似也覺得愛《騷》是不尋常的現象，於是替葉贊向衛道之士們打圓場：葉贊愛《騷》，是由於其人其文的特點與

---

<sup>56</sup> 同上註。

屈子相近。因此值得諒解。依照這樣的推論，縱然其人潔廉好修，若其辭不瑰麗可喜，則當直溯《六經》，束《楚辭》而不讀可也。這種論調根本蒼白無力。其次，何喬新認為屈騷為衰世之音；而當今天子聖明，摒讒佞，進忠良，非戰國之世可比。葉贄自應以瑰麗之詞，鳴國家之盛。

上述三人之言，正好代表了明代前期三種不同的《楚辭》論。「客」的意見純然由道學角度而發，直斥《楚辭》乃變風變雅之末流，與六經有扞格，醇儒莊士或羞稱之。何喬新的意見近於臺閣文人，委蛇於道學、詞章兩端。他們一方面對於《楚辭》的瑰麗不無喜愛，另一方面又受道學跟政治的掣肘，強調文學要鳴國家之盛，因此希望調和矛盾，以瑰麗之詞歌詠太平。至於葉贄的意見，則是新興文學師古說者的心聲。成化年間，汪直攬權，吏治腐敗。葉贄的言論，當係有感而發。當時正直的士大夫們眼見朝政江河日下，文風疲弱，故思以藉屈騷的哀婉瑰麗而振起之。然而由於政治的嚴峻、道學的獨盛，廣大士人不敢暢所欲言，抑或對盛世依然存有幻想。何喬新視葉盛為晚輩，二人同是臺閣中人。然因何氏受道學影響較深，對《楚辭》的態度因此也就不及葉盛的正面了。老友葉贄之愛《騷》，他要反覆為之開脫，在今天看來固然有些可笑，但卻可由此窺見當時學術思想之沉寂保守。

## 結語

師古說興起於元代後期，明代建國後影響逐漸消退，直至弘治以後方復蔚為大宗。《明史·文苑傳》云：

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sup>57</sup>

聲勢一時無兩。前後七子的師古說，不是產生於一夜之間。郭紹虞已明確指出：元末楊維禎論文，師心、師古並重，前後七子和公安派都是楊氏「鐵崖體」的變相。明太祖立國後，楊氏的主張被宋濂的文道合一論取代；永樂以後，臺閣文風大行其道，師古說進入了漫長的蟄伏期。然而在明代前期的一百四十年間，師古說並非全然一潭死水。由於時局變易、學風移轉、地域文化、個人經歷等各種原因，師古說不絕如縷，而以吳中文士為主。七子出現之前，這些吳中文士的師古說雖然沒有在當世形成一種潮流，但已呈現出與臺閣文風不同的面貌，與七子的主張有直接的傳承關係。

入明以後，元代後期流行的師古、師心風氣雖然被宋濂的文道合一論所取代，但卻由於政治、文化等原因依然留存於吳中一帶，形成博學、

---

<sup>57</sup> [清]張廷玉主編：《明史》，頁7307。

尚趣的傳統。這個傳統影響到吳訥，也影響到眾多的吳中文士。矢志文人中，師古者或如桑悅引屈子為知己，或如祝允明藉論《楚辭》以抒憤；師心者或如沈周、文洪等著重於屈騷的雅趣，或如唐寅、文徵明等絕口不言《楚辭》。不同的態度，是他們不同文學取向的結果。由於自身的文化傳統與廟堂文化的衝擊，在朝的吳中文士論文時一直抱有師古的傾向，這在他們的《楚辭》論上尤其明顯。從徐有貞對招魂的考索，到吳寬對〈九歌〉之名的質疑，都可看到明代考據學萌發的痕跡。而正德間王鏊的〈楚辭序〉，極力推崇王逸《楚辭章句》的訓詁之功，強調其不可取代的價值，更宣告了朱子《集註》獨尊局面的終結。

明代前期，徐有貞、吳寬、王鏊等人都擔任了吳中文學與臺閣文學之間溝通調和者的角色，但較早把師古說重新帶回廟堂的是常熟人吳訥。除環境因素外，吳訥對於師古說的繼承和提倡，也有個人因素。他本為醫者，並非由科舉入仕；雖然「於性理之奧多有發明」，卻不流為迂儒。吳氏《文章辨體》的出現，證實臺閣文風獨領風騷的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師古說非但沒有銷聲匿跡，且展現出頑強的生命力。《文章辨體》很大程度上受到元代祝堯《古賦辨體》的啟發，書中也時時引用其言。這顯示元代後期的楚辭學在明代前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繼承。弘治以後，辨體之風方才興起，徐師曾本吳書而作《文體明辨》，此外又有黃佐《六藝流別》、胡應麟《詩藪》、許學夷《詩源辨體》等作並行於世，然追本溯源，吳氏《文章辨體》於明代可謂嚆矢，於明代前期尤為特例。書中強調了《楚辭》對《詩》之六義的承襲，也指出《楚辭》

幽憤感傷的情調是《詩》所沒有的。吳訥認為，賦體起源於《詩》，而成熟於《騷》。他將賦分為三類：詩人之賦、騷人之賦、詞人之賦。詩人之賦為《詩三百》中的運用「賦」法的段落，騷人之賦指屈子的作品，而詞人之賦乃是西漢以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人的文字遊戲。《騷》尚能得《詩》之精神，而詞人之賦則徒具《詩》的寫作手法而已。

元末師古說在吳中的發展軌跡是一條直線，而臺閣諸臣對此說的接受軌跡則是一條曲線。首先，宋濂的文道合一論取代了師古說。其次，三楊沖融演迤的臺閣文風淹沒了師古說。不過永樂以後，臺閣諸臣對於《楚辭》的正面態度是有跡可循的。宣德、正統間，某些臺閣文人早已表現出對《楚辭》的喜好。如葉盛支持友人劉昌對《楚辭》的熱愛，又在《水東日記》轉錄了南宋高元之慷慨激昂的〈變離騷序〉，乃致後世誤認此序為葉作，這些情況都很值得注意。此外，部分臺閣文人更逐漸轉化為師古說者。成化間，工部郎中劉昌、刑部主事葉贄身為朝廷大員，卻獨愛屈騷。當他們遭到一些衛道之士的反對時，都毫不退縮地為屈子打抱不平，這在正統以前是不太可能發生的。葉、劉愛《騷》心切，乃至要將居停之處冠以騷名，這在當時未必是一種風尚，卻顯示出臺閣中的有識之士對文學風氣不滿的態度。

明代前期百餘年間的吳中文士多主師古。他們或處江湖，如桑悅、沈周、祝允明等，或居廟堂，如吳訥、徐有貞、劉昌、葉盛、葉贄、王鏊等。臺閣文風從永樂之世發展到成化、弘治間，已成因襲冗濫之勢；而吳中文士與臺閣作家的主張最為不同之處，就是對《楚辭》的褒揚和

模仿。葉盛在〈寫騷亭記〉中稱讚劉昌：「眾囂囂兮，而子獨《騷》兮。」如果將這句話移用在上述吳中文士身上，也非常合適：他們在一片雍容平正的風氣下甘冒不韙，推崇《楚辭》，這種情況在當時雖屬稀有，卻醞釀催生了七子波瀾壯闊的一頁。明代文學終於在正德後擺脫道學附庸的身分，崇尚格調、追摹秦漢的師古說從此成為文壇的主旋律，這與明代前期吳中文士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明馮紹祖萬曆丙戌刊本，1974年再版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重印修訂本

[宋]朱子：《楚辭集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

[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初版

[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影印初版

[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初版

[明]徐有貞：《武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明]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初版

-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周瑛：《翠渠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吳寬：《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王鏊：《震澤長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王鏊：《震澤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李東陽：《李東陽全集》，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初版
- [明]李東陽：《李東陽續集》，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初版
- [明]程敏政：《明文衡》，臺北：世界書局據明刊本影印，1967年初版
-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邵寶：《容春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沈周：《石田詩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 [明]文洪：《文涑水集》，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

明刻本，1997初版

[明]王錡：《寓圃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初版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明]祝允明：《懷星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

[明]陸深：《谿山餘話》，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影印初版

[明]楊循吉：《吳中往哲記》，[明]黃魯曾：《續吳中往哲記》，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出版公司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1996年初版

[明]張泉：《吳中人物志》，臺北：學生書局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隆慶間刊本影印，1969年初版

[明]黃姬水：《黃淳父先生全集》，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中山圖書館藏萬曆十三年(1585)顧九思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97年初版

[明]袁宗道：《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初版

[明]蔣之翘：《七十二家評楚辭》，天啟六年(1626)刊本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版
- [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983年初版
- [清]永瑤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  
初版
- [清]張廷玉主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
- [清]沈德潛編：《明詩別裁》，香港：中華書局，1977年初版
- [清]沈翼機等纂、稽曾筠等修：《浙江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據光  
緒二十五年（1899）浙江書局重刊本民國二十三年（1934）影印  
本（按：光緒本據雍正十三年（1735）本重刊。）

《續文獻通考》

二．近人著述

- 孔德成：《明清散文選注》，臺北：正中書局，1974年初版
- 王衛平、王建華：《蘇州史紀(古代)》，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初版
- 史小軍：《復古與新變：明代文人心態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初版
- 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初版
- 姜亮夫編：《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新一版
-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年初版

- 張健：《明清文學批評》，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年初版
- 許總：《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南昌：百花洲出版社，1999年初版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初版
- 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初版
- 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
- 黃仁生：《楊維禎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5

## 年初版

- 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年初版

-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初版

- 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 年再版

- 鄭利華：《明代中期文學演進與城市形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5年初版

-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初版

- 吳智和：〈明代蘇州社區鄉土生活史舉隅——以文人集團為例〉，載《方  
志學與社區鄉土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97  
年

- 林賢得：《明代吳中詩派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
- 邵曼珣：〈蘇州文人尚趣之研究〉，載《古典文學》第12期，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
- 范宜如：〈文學中的人地關係論述——以吳中地域為例〉，載《中國文學研究》第四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初版
- 范宜如：《明代中期吳中文壇研究——一個地域文學的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陳耀基：〈楚辭體式探論〉，載《漢學研究》第22卷第2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4年12月
- 鄭利華：〈明代中葉吳中文人集團及其文化特徵〉，載《上海大學學報》第4卷第2期，上海：上海大學，1997年

**On the Chuci Study of the scholars from Jiangsu  
during Yongle to Hongzhi Periods (1403—1505)**

Nicholas L. CHAN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15<sup>th</sup> century, i.e. the first half of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the writers in the Imperial Ministries were very influential in China. Deeply affected by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neo—Confucianism, these writers preferred pure and refined articles eulogizing the flourishing ages of harmony, prosperity and

pe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6<sup>th</sup> century, however, this literary trend was displaced by classicism. Qu Yuan (ca.343 – ca.277B.C.) was regarded a heretic of Confucianism and much criticized, hence the writers in the Imperial Ministries made few comments to *Chuci*, a poetry collection in which Qu's works were compiled. Due to the political, academic,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some criticizers emerged in the 15<sup>th</sup> century and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gainst the writers in the Imperial Ministries, and many of them were the natives of the present Jiangsu Province. These criticizer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ioneers of the 16<sup>th</sup> century's classicists. Due to the unique nature of *Chuci*, the new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would be immediately found in the discussions about *Chuci*, as long as there was a change in the academic trend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dominated by Confucianism. This article therefore aims to carry ou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huci* study of these pioneers of classicism from Jiangsu, and to examine how they interacted with the the writers in the Imperial Ministries through *Chuci*.

Keywords: The scholars from Jiangsu , Classicism , Chuci ,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 The writers in the Imperial Ministries

( 責任編輯 : 胡瑋菱 王志中 )

